

共产国际和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比较研究

杨云若 李良志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最基本保证。本文试图通过共产国际和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策略、方针的比较研究,说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存在和发展,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吸收了共产国际指示中的正确因素,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结果。

一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酝酿到建立,均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推动。

1935年7月,在德意日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世界面临严重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国际“七大”分析了法西斯上台的原因,总结了共产党人应吸取的教训,明确提出:要战胜法西斯,各国共产党人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大会所作的重要报告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必须着手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应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根据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北之后正在进逼华北的形势指出,中国正逢空前的民族危机,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统一战线问题,不仅具有头等的意义”,而且“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除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它的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① 由王明起草并经中共代表团讨论通过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正式批准。

共产国际“七大”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确立的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改变了过去把统一战线作为孤立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做法,开始把它变成开展反法西斯斗争的真正有效的因素;纠正了前一阶段的“左”倾关门主义,抛弃了下层统一战线的口号。“七大”制定的方针在中国问题上虽仍存有某些“左”的提法,但从总的策略路线上已作出了重要转变。

共产国际“七大”所确定的策略路线,对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突破下层范围的局限,不再把中间势力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具有重要意义。1935年11月中下旬之交,中共代表团成员张浩自苏联回国到达陕甘边区定边,随即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以及关于中共策略方针的指示:一,实行“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二,以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统一战线的最高表现形式;三,改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四,改变富农政策及相关政策,等等。12月6日,中共中央即发布《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阐明为反对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为建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改反对富农的策略为只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封建剥削部分),并取消其高利贷;对其所经营的土地及商业和其它财产,均不没收。

同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正式肯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辑,第398—400页。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建议,宣布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毛泽东分析: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所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因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和争斗。^①毛泽东着重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指出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其左翼有参加抗日的可能,九一八事变以来蔡廷锴、马占山等参加抗日说明了这点;但民族资产阶级有欺骗民众的资格,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由此可见,在要不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共产国际的作用是清晰可见的,而在建立什么样的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将共产国际正确指示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态度,既接受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资产阶级的正确主张,又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部分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作了分析,坚持了中共在统一战线中批评同盟者的方针。

1936年3月7日,德军进占莱茵兰非军事区,形势日益紧张。这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希望中国能立即实现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以有效地牵制日本,减轻苏联在远东地区受到的战争威胁,使其能集中精力对付欧洲的法西斯德国。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中明确提出:“必须在中国造成这种局势,必须在蒋介石的军队和国民党中开展这种运动,使蒋介石不得不参加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②他主张在中国从速采取发动国内一切力量起来迫使蒋介石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4页。

② 葛里高利耶夫:《格·季米特洛夫——一位国际共运的著名领导人》,保加利亚1972年版,第394页。

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力主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国际的方针对中共中央起了重要影响。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变的枢纽。从此国共双方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开始了积极有效的谈判。

中共在谈判中，以斗争求团结。中共承认中国政局的客观现实，宣布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苏区改为边区，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与此同时，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独立领导自己的军队和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联盟，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抗战的路线。但国民党蒋介石却想通过谈判把中国各党派统一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力图限制和溶化共产党。在国共两党谈判过程中，中共就两党合作形式、红军编制、边区和红军的领导权以及红军作战原则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在各方政治力量的敦促下，直到全国抗战爆发，蒋介石在1937年9月终于正式同意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毅然转变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正确方针，但在建立统一战线的实际过程中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却是由中共和毛泽东自己完成的。

二

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到武汉撤退的一年多时间中，国共两党在合作抗日方面有过一段较好的日子。

1937年9月，国民党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公布“惩治汉奸条例”，不再把治罪目标对准共产党人，而是惩治汉奸。在日寇侵略面前，国共两党军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侵略计划，显示了国共合作的威力。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

描述这一段历史：“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段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新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①但是，即便在这段时间，国共两党围绕着如何争取抗战胜利，即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的问题上，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立场。蒋介石实行单纯政府军队抗战方针，想依赖大国取得胜利。针对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毛泽东在1937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上，明确提出应实行全国军队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在和国民党关系方面，应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报告中，强调为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报告还指出抗日统一战线中有左中右之分，我们的任务是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中间集团（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孤立右翼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报告强调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很为不安，他们怀疑中共能否按国际的意愿实行政策上的彻底转变，同蒋介石建立牢固的统一战线。1937年8月10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会议上就中国问题所作的发言中说：“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现在，“党的政策和策略需要作出180°的大转变”，同是这些干部，他们能否正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8页。

确地实行政策上的根本转变？他说，从党的文件中，已能看出有使党迷失方向的因素，这些因素必须纠正。他提出应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以“加强中国国内的干部队伍”。^① 9月下旬，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醒中共领导人在统一战线问题和国共合作问题上要提出适当的要求和口号，不要太高太左，要坚持以现在的国民政府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不要设想另外建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国共合作要坚持“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原则，不要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同时，决定派王明回国。^②

由此可见，抗战初期，共产国际同毛泽东在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上是有所区别的。兹比较如下：

（一）考虑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有所不同。

共产国际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它较多地是从世界形势和各国阶级力量对比的状况出发，为了制止战争，保卫和平，而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策。至于如何结合各国具体情况确定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各种具体政策，共产国际在这方面不可能考虑那么周全。同时，国际在制定具体方针时，也包含了考虑保卫苏联的需要。由于法西斯战争威胁日益严重，苏联在紧张注视着希特勒德国种种举动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东部边境的局势。国际希望中国国共两党能保持牢固的统一战线关系以维持抗日局面，如果中国能长期拖住日本，苏联就能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正是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质，也出于这种利害攸关的考虑，苏联积极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则根据中国国情考虑：国共两党既有合作关系，又有不同的阶级基础和复杂的历史关系，抗战中将呈现出非常尖锐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既要打败

① 《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三），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② 《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和中国人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参见《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第427页。

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又要保持已有的中国革命阵地的存在和发展。中共认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目标。

(二)关于应否公开提出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和无产阶级领导作用方面的分歧。

尽管共产国际、斯大林和中共中央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但大敌当前,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国共两党必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在这一点上,两者认识是共同的。同时,在保持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组织上的独立性问题,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这时看法也是相同的。

但是在政治上,共产党应否公开提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是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意见分歧的焦点所在,并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力量比较弱小,中国抗日战争主要得依靠蒋介石国民党;依靠蒋介石国民党,即使不能打赢日本,至少也能长期拖住日本。他们担心毛泽东提出的扩大左翼、争取中间、孤立右翼的主张会使统一战线破裂而危及抗日局面。于是,王明回国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特别嘱咐王明,中国共产党应采用法国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经验。王明回国后,全力贯彻共产国际的方针,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原则和民主民生问题,认为这是共产国际所担心的会使中国共产党“迷失方向的因素”。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强调,抗战以来国民党已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是统一战线中的主要力量,我们应承认国民党的优势,因此我们不能“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权,只能提“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否则我们会吓跑同盟者。^①王明仿照法国共产党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17页。

“一切经过人民阵线”、“一切服从人民阵线”的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应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

“一切经过人民阵线”、“一切服从人民阵线”口号,是法共在法国建立了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后提出和执行的工作方针。1935年7月,在法共和法国社会党带动下,法国69个党派、团体和协会宣告组成人民阵线。面临人民阵线可能在选举中获胜的前景,法共曾准备在联合政府中承担责任。但共产国际担心法共参政可能会引起右派反对,导致人民阵线不稳,影响反法西斯斗争的大好局面,不同意法共参政。1936年初,法共同社会党制定了人民阵线纲领。在随后的选举中,人民阵线大获胜利,由社会党勃鲁姆组阁。此时,法共提出了“一切经过人民阵线”、“一切服从人民阵线”口号,试图以此约束社会党的行动,维护法共在人民阵线中的地位、作用及所争取到的种种权利。这个口号既损害了法共的独立自主,又未能束缚社会党的手脚。以后法国人民阵线瓦解,法共被宣布非法,所争得的权利也随之丧失。王明不顾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背景和本身的特征,把法共并不成功的经验照搬过来,实在是无的放矢,重蹈覆辙。

在1938年9—11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提出了批评。他提出法共的经验不一定符合中国实际。由于时间和地域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尚不清楚法国人民阵线正在走向破裂的现实,但他认为中国的国民党是当权的党,拥有几百万军队,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统制着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发展,不愿制定共同政治纲领,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须事先取得国民党蒋介石的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

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① 毛泽东着重阐明了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鉴于国民党上层亲日派妥协投降倾向日益严重,日本帝国主义正在阴谋分裂抗日阵营,一方面应明确国共长期合作抗日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为使抗日统一战线真正得到巩固和扩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了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没有民主、民生问题的适当解决,就不能广泛动员人民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毛泽东阐明了统一与独立的辩证关系,指出正确的方针只应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否则合作变成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与独立自主原则密切相关的,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在要不要公开提出领导作用问题上毛泽东和共产国际的意见也有差异。共产国际和王明不同意在统一战线中鲜明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认为在统一战线中“空喊”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只能吓跑同盟军,而吓跑同盟军就会吓跑蒋介石,破裂统一战线;认为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正确口号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而毛泽东则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毫无疑义地有个领导责任的问题,也应鲜明地提出此问题。^②

(三)关于工作重心方面的分歧。

共产国际从苏俄十月革命城市起义的模式出发,始终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城市。季米特洛夫在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在城市中开展工作,应在城市工人阶级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他认为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队伍,工人所占比重很小,中共党领导的根据地远离工业中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4页—505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42、361—362页。

心,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会使党组织受农民思想影响,农民的狭隘思想意识会影响同国民党的统战关系。他建议中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将工人阶级置于共产党的影响之下,使党不仅可以依靠已掌握的武装力量,而且能够通过不同形式得到国统区(如上海广州和其它重要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的支持”。^①王明回国后,便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城市和与国民党谈判方面。

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认为无产阶级要保持自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领导作用,一方面是对动摇不定的资产阶级要有正确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是要紧紧依靠最可靠的基本群众——农民同盟军。在抗日战争中,有了农民,党和军队便能进能退,如鱼之在水;他甚至说:“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②1938年5月14日和22日,中共中央在给江苏省委和华中工作的两封指示信中,还详细地论述了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党应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共产国际始终强调城市工作和工人工作。在1938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中,一方面承认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强调中共必须“首先是在大城市内,在军事战略区域内,在军事工业和工人中及铁路工人中建立党组织”。^③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始终也转不过弯来。

(四)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分歧。

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一再阐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尤其是民族战争情况下,共产党的游击战争有充分的活动地盘和广大的群众基础,它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它有自己的防御和进攻的战略战术。因此,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王明轻视中国共产党

① 《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0期,第38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2页。

③ 见《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以下未注出处者同此。

领导下的游击战,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强调要打运动战。^①

三

抗日战争时期国际形势错综复杂、风云变幻,时常影响中国抗日作战和国共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

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以后,由于其广阔后方受到抗日游击队的威胁,它的对华政策由军事进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1938年9月末,英法德意签订慕尼黑协定,随后英法美开始在中国策动蒋介石反共反苏。蒋介石希望在抗日过程中,达到“溶共”的目的,他曾在庐山训练班说,“要在抗日过程中,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五分之二”。但经过前阶段的抗日,中国共产党不仅未被削弱,反而日渐强大了,蒋对此感到十分不安和恐惧。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会后颁发了一系列秘密反共文件,国共磨擦加剧。10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规定,除继续对共产党“政治解决”外,增加了“军事反共”一项。1939年12月至1940年春,国民党在陕甘宁、晋西和太行等地区发动了第一次反共浪潮。

中共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胜利地击破了国民党在各地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从尊重共产国际出发,从希望国际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情况以消除国际和中共之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问题上的分歧出发,毛泽东不断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日作战和国共关系的情况。

1939年11月,周恩来赴莫斯科治臂伤并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在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情况时,他介绍了蒋介石在各地压迫

^① 王明:《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与实践——在武汉大学演讲词》,载《战时青年》。

和进攻共产党的种种举动,指出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我们必须“对他进行批评”,“提出抗议”。^①

共产国际根据蒋介石的反共表现,觉得国民党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妥协投降倾向。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的决议》指出,当前,中国民族解放战争“正经历着一个危急的变动时机”,这时,“民族统一战线分裂的危险及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危险成了基本的直接的危险”,“从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方面来的投降的危险,现在比整个战争中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更加尖锐”,因此,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的危险”,“必须最无情的在广大群众眼前揭露一切反对中国底自由和独立的阴谋家,孤立和从抗日战线中驱逐他们”。1940年3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又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很复杂”,“特别是在抗日战线队伍中存在投降派和妥协派的情况下,投降已成为直接的实际危险”;号召中国青年以“一切力量同投降行为作斗争”。^②

由于苏联希望中国能坚持抗战以拖住日本,这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克服投降妥协危险、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愿望是一致的。但对如何克服投降妥协危险、如何对待国民党的进攻、如何巩固统一战线方面,彼此看法有所不同。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同年12月,写了《论政策》的指示。他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政治军事进攻仍在继续的情况,针对党内存在的“左”右两种倾向,总结了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策略”,必须是又斗争又团结,“而以斗争

① 周恩来:《中国问题备忘录》,《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63页。

② 《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三)》,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对顽固派的斗争，必须坚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①但这一策略思想，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压力，这集中表现在皖南事变前后对国民党的策略方面。

皖南事变前，毛泽东曾准备对国民党实行“自卫的反攻”。1940年11月4日，他在给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的信中提出：“我们现在全国加紧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斗争，一面对蒋介石采取缓和态度，答应把现在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开往江北，以期缓和蒋之进攻，但“决不能退往华北三省让其过黄河构筑新的万里长城致被封死，被夹击，被消灭，而让蒋介石安然投降，在我取退让态度而彼仍坚决进攻之时，我们拟举行自己的反攻，打破其进剿军与封锁线”。信中还说：“如不采取此种军事步骤”，“我之地位是危险的”，但如我采取这一军事步骤，蒋介石有“可能与我们最后破裂”，因事关重大，最后决心还没有下，希望国际早日予以指示。^②对毛泽东的这封函件，共产国际立即作出反应。11月23日，季米特洛夫给中共领导人回信指出：在没有详细弄清情况之前，中国共产党不要对国民党采取任何行动。他警告：举行自卫反攻，“有可能使蒋介石在人民面前把你们说成是抗日斗争团结的破坏者，并利用你们的行动来为自己同日本人缔结妥协性和平的企图辩解”。他还指出，当前的任务，是要消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分歧，首先需要停止中共武装力量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冲突。^③共产国际不同意中共采取自卫反击行动。

12月9日，蒋介石限令长江以南新四军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于翌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03—709、721页。

②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

③ （保）尼·阿莱斯基：《格·季米特洛夫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载聊城师院编《共产国际研究》，1990年第2期。

地区。中共中央于12月25日发出党内指示：国民党既然执行“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我们亦仍是一面团结一面斗争的革命的三面政策”，提出“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举自卫战斗以粉碎之”。^①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很不放心。1941年1月4日，季米特洛夫又致电毛泽东：“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您不应以破裂为出发点”；“要依靠那些为保持统一战线而仍坚持斗争的群众，避免发生内战，尽我们共产党和军队所能作出的一切努力避免内战的扩大。请重新考虑一下您目前对这个问题的态度”。^②

皖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一度决定对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指示各地作好准备，以对付最严重事变。^③1月15日，刘少奇向毛泽东等建议：鉴于国民党“仍继续抗战，对共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怕乱子闹大”，建议中共方针为：在全国主要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暂时不实行反攻”。^④毛泽东等人考虑了共产国际意见和刘少奇的建议，于1月19日致电彭德怀、刘少奇，表示决定“在政治上全面揭露蒋之阴谋”，“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手”。^⑤2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电中指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然因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决定目前“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取守势，惟

① 《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1940年12月25日）。

② 《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三），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事变中我之对策给刘少奇、陈毅的通报》（1941年1月13日）等。

④ 《刘少奇关于主要应从政治上进行反攻问题向毛泽东等的建议》（1941年1月15日）。

⑤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在政治、军事、组织上应采取的步骤致彭德怀、刘少奇电》（1941年1月19日）。

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① 同日，中共中央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1月25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数次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已宣布新四军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的方针是“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电报说：让步阶段已经结束，“蒋以为我们怕破裂，我们须表示不怕破裂”。^②

苏联、共产国际对皖变是密切关注的。他们对国民党顽固派也提出了批评和委婉的警告。1月17日晚，苏联外交次长洛佐夫斯基请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转告国民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之事”。1月25日，苏驻华大使潘友新在重庆面见蒋介石，提请他注意：进攻新四军“损害了中国的抗战力量，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崔可夫也相继会见了何应钦、白崇禧及其他国民党官员，暗示国民党如不悬崖勒马，将导致苏方停止援助。但出于维持中苏外交关系的考虑，正如邵力子所说，苏联的态度是“审慎”的。得到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报告后，共产国际经18日和21日两次讨论，决定中共应政治解决冲突。^③ 20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要中共严格注意把握政策。2月5日，季米特洛夫来电，提醒中共中央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应将斗争矛头指向亲日派。2月间，苏联驻重庆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向周恩来表示：日本还会进攻蒋介石，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的中心，因此，要对蒋让步，要缓和态度。

以上表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采取政治攻势的做法也是有顾忌的，他们生怕破裂了统一战线。对此，毛泽东认为应向苏联和共产国际做些解释工作。毛泽东要周恩来向崔可夫解释，在目前情况下，要我们对蒋让步，是危险的。统一

①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电》（1941年1月20日）。

② 《毛泽东关于对蒋介石应采取对立态度不怕破裂致周恩来》（1941年1月25日）等。

③ （保）尼·阿莱斯基：《格·季米特洛夫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战线内须以斗争求团结，一味消极退让是不能保持统一战线的。目前逼蒋向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因为进攻和破裂是蒋先发动的。经过我们的政治攻势，蒋已受到从未有过的内外责难。蒋对我缓和，我也可稍示缓和，但目前尚非其时。政治攻势“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①同时，毛泽东专门给共产国际写了一份综合、分析性的长电，说明新四军的转移和重新部署，同国民党长期谈判的前后过程；说明蒋介石背信弃义，不择手段使新四军上圈套的过程；说明皖南事变对共产党、对抗战和对华中地区造成了较大困难；同时指出了挽救局势、弥补损失和善后的方针。^②毛泽东坚持了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意见，表明了中共不能因为共产国际是上级领导而接受其不合时宜的政策。

皖南事变后中共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斗争，在国内争得了广大中间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使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陷入空前孤立。国际上，除苏联外，英美也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此种内外情势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在反共行动上有所收敛。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被迫宣称，“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14日，他又约周恩来谈话，表示国共两党若干问题可以提前解决。事实证明，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全面声讨、揭露并在军事上作好准备的政策是正确的。

四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共产国际以及国际解散后的联共(布)中央国际宣传部，在中共的统战方针问题上，仍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存在分歧。

① 《毛泽东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致周恩来》(1941年2月14日)。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1942年4月18日,周恩来自重庆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列举了三个月来蒋介石策动的反共事件109起,指出“新的反共高潮已在上涨”,望全党提高警惕,表示只要“我们抓紧着抗战与民主的旗帜,他们一切的进攻和强迫,便不能不受到限制”。^①为使共产国际了解中国情况,中共中央将周恩来提供的情况和对时局的估计及时转告了国际。6月15日,季米特洛夫致函毛泽东,指出:“目前的形势绝对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尽量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加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我们得知蒋介石和国民党首领在想方设法离间共产党,目的是使共产党威信扫地,陷于孤立。如果我们的人中了计,而不是明智地对此作出反应,那么就不能认为我们方面的政策是正确的。”共产国际对周恩来当时在重庆进行的揭露蒋介石反共行为的活动持否定态度,生怕刺激了蒋介石。信中提出“请认真注意这一情况,并采取紧急措施使中共驻重庆代表处执行坚定的、始终一贯的、旨在改善共产党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政策,要避免从我们这方面发生一切可能导致这种关系更加紧张的做法。必须弄清同蒋介石直接发生争执的问题并尽力设法解决这些问题”。^②随即,中共中央在1942年7月7日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中表示: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中共“愿尽自己能力来与当局商讨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按照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不给日寇以任何挑拨离间的机会”。^③1942年9月8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指示中说:“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以求悬案之

① 《周恩来同志关于对反共高潮的估计致毛泽东同志并中央电》(1942年4月18日)。

② 《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三)。

③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606页。

解决与和好之恢复。”^① 9月15日,毛泽东在给李先念指示中说,“目前,是极力争取国共好转,恢复两党谈判,使新四军取得合法地位,以便坚持抗战时期。你们在这次行动以后,望极力避免打磨擦仗,并设法与周围国军取得和解为要”。^② 之后,毛泽东派林彪、林伯渠先后去重庆与蒋谈判,解决国共争端。

不过此时毛泽东深感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有主观主义倾向,中共党内不少人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方面有不足。自1941年5月始,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它是一次克服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运动。

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对中国党的整风运动了解不够,也很不理解,认为中共是在“搞清党运动”,“搞无原则的派别斗争”。^③ 在运动的高潮时刻,共产国际执委会打破了“七大”后不干涉各国党内部事宜、不再向各国党派遣代表的惯例,向中共中央派出了常驻延安代表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他于1942年5月11日到达延安,化名孙平。

孙平到延安后,经常批评中国共产党人对蒋介石过于警惕。共产国际从他那里得到的都是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基础遭到动摇的消息。关于整风运动,孙平和王明都向共产国际作了违反事实的报告,说毛泽东将主要精力放在整风运动上,目的是为了确立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些消息,自然引起了共产国际更大的不安。

1943年12月22日,共产国际解散后任联共(布)国际宣传部主任的季米特洛夫为整风问题专门致信毛泽东,这封信正确的批评了整风运动中大搞“审干”所出现的错误:“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

① 《毛泽东关于国共合作中我之斗争方针问题给周恩来同志的指示》(1942年9月8日)。

②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614页。

③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215页。

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但是,这封信把整风运动说成是“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认为当时中共执行的是“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不正确的。^①

所谓“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大概是指中共中央将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从前线召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认为这是消极对日,保存实力。实际上当时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仅是一部分高级干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仍留在前线坚持抗日斗争。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日寇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大扫荡”。中共中央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进行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党领导广大群众创造了闻名于世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等战术,胜利地打击日寇。在晋察冀的冀中抗日根据地,从1942年5月中旬到7月初,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率5万余人对冀中实行“大扫荡”,根据地军民共作战270余次,毙伤日伪军11000余人,粉碎了日寇的围攻。其他根据地的情况大体也是这样。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的抗日斗争是非常积极的。敌华北派遣军司令部1943年度综合战果报导说:“敌大半为中共军”,“在本年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党军。”^②

所谓“摆脱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方针”的指责,更是反映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共的偏见。实际情况是自皖南事变风波逐渐平息之后,中共中央即采取了缓和国共矛盾,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42年10月,毛泽东派林彪前往重庆与蒋介石、张治中、王世杰等就中共的合法地位、八路军扩编及补给、承认边区及敌后抗日政权、八路军新四军北移、停止国民党军之封锁磨擦等进行谈判。林彪在重庆历时共8个月之久。毛泽东这时嘱咐

①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第3页。

② 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9),第115页。

周恩来,“国共合作是第一位的,决定性质的”,与其他民主党派、地方军人的合作“是第二位的,次要性质的,如果二者发生矛盾,应使第二位服从第一位,这是基本原则,必须坚持”。^①可是这次谈判,由于蒋介石坚持对中共的各种压迫政策,毫无成果。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在谈判之时,公开发表了鼓吹封建法西斯主义,要强化一党专政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旋即发动了第三次反共浪潮,企图“闪击延安”。中共中央一方面作好应战准备,另一方面动员舆论揭露。这使新的反共浪潮刚开锣就偃旗息鼓了。8月13日,毛泽东在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中指出,我党的政策仍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大内战”。^②10月5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指示暂停转发《解放日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的稿件,“风平浪静,以示缓和”。^③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请他相信,中共执行的下述政策是正确的:党的武装力量同侵略者积极斗争,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苏联和联共(布)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爱。1月7日,毛泽东又致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衷心感谢”。指示,我将深入研究这些指示,注意它们,并根据指示采取措施”。^④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⑤1月31日,阎锡山部东渡与中共太岳部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611页。

② 《毛泽东关于击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的形势和党的政策》(1943年8月13日),同上,第662页。

③ 《毛泽东关于暂时停止揭露国民党以示缓和致董必武电》(1943年10月5日),同上,第669页。

④ (保)《世纪》杂志1986年第5期,参见:(保)尼·阿莱斯基:《格·季米特洛夫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⑤ 《中央关于对待国民党军队执行自卫原则的指示》(194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675页。

队发生冲突,欲挑起战事。滕代远请示中央拟自卫反击。毛泽东于2月8日复电:“先行忍让”,“顾全大局”,“彼若坚决来攻,以反攻姿态打击之,但非最后不得已时,不要发生冲突”。^①

以上事实证明,在整风运动时期,中共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寇采取什么“退缩”方针,也丝毫没有“偏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综上所述,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问题上,共产国际、联共(布)和毛泽东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况缺乏具体了解,其批评指责多出于误解。而毛泽东依据中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正确指导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斗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① 《关于对待国民党六十一军进犯的方针的指示》(1944年2月8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同志致滕代远、邓小平电)。